

從八一三到八一五

鈕先銘

真面目的抗戰，始之於民國二十六年的一—三，終止於民國三十四年的一—五，八年的八月，這是我們民族生死的一場搏鬥，你能不相信國運的「八一五」字麼？——

一、抗戰到底自那一日開始

從狹義來講，大家都認為抗日之戰是起於民國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因名之為七七事變，其實從廣義來說，從民國二十年的東北事變之後，我們無時不在準備對日作戰，以期雪耻復仇，這樣過程，經過了七年之「癢」。兩國之間，不！應當說是兩軍之間，因為國與國尚在談敦睦邦情呢！這種軍與軍之間，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的事件，簡直是罄竹難書。在當時的名詞，我們都稱之為地方事件，誰也沒有認為是全面抗日。

以蘆溝橋事變來說吧！在中日一連串的地方事變中，本不算得是一件太了不得的事情。不說比不上日軍奪取我東北，即使北長城事件，冀東特區，都只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割一刀我們也都忍受了，七七僅是軋一針，為什麼就受不了了呢？所以我認為：七七事變並不一定是我們抗日戰爭，真面目的開始。

不錯，抗日戰爭是打勝了，那末誰也不敢否認這是一個不算太壞的時機。其實，七七這一個時機，當時並不是太有利於我，反無寧是有利於對方。

日本軍閥對我們之想鯨吞與蠶食，自不待言

。可是蠶食比鯨吞來的容易和自然，因之一向都採用這種方程式來對付我國，而用來得每每是怡然自得。

可是自從我們領袖 蔣公所領導的北伐成功之後，又格遵 國父的遺教，在非常破壞之後而加以非常的建設。轉眼使四分五裂的中國，即將統一。於是日本軍閥便不得不改變其侵略的方式，由蠶食而變為鯨吞。因是之故，自九一八以後，一連串的中日事件，都是日本軍閥一手的創作，緊迫釘人，迫使我們來和他作戰，以企圖達成滅亡中國的最後目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七七」——這個時機，是有利於敵方而不利於我們。

在當時日本軍閥不僅想從冷戰到熱戰，以期消滅我們，這當然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而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裡，也有四大類的人們，想借對外戰爭，以達成其本身的苟安和坐大的目的。這四種人使是中共，舊軍閥、官僚、和我們自己黨內的失意政客。

國內的舊軍閥，官僚本是人類的渣滓，一向是在夾縫中圖存。黨內的失意政客，也無非是想利用一致抗日的口號來滲透政府，這三種人都不大關輕重。最重要的當然要算是中國共產黨。

自從江西勦匪節節勝利後，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奔」的逃竄到陝北，假若當時再加一點力量來把他們撲滅的話，我們不僅是中國的本國史，即使是世界史，也許得另換新頁。可惜是功虧一簣，殘留了一點細菌，致令星星之火終以燎原，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的一大悲慘命運。

這一次的關鍵，全繫於所謂雙十二事件，便是張學良劫持我 領袖於西安臨潼，時間是民國二十五年的歲暮，這一次事件的結果：是強奸了沉默的大多數的民意，而迫令加速對日抗戰。

「安內攘外」，「敦睦邦交」這是七七事變前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為什麼我們的 領袖當時要那樣的容忍呢？無非是想以時間來換取空間，以作萬全的準備而後再來對外作戰。所以我說：七七並不是最有利於我的抗日時機；從事後來看，我們都覺得 領袖當時的容忍，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假設當時先能消滅中共的殘燼，而又一統中國，也許抗日戰爭不會拖延到八年之久，戰後更不致令赤燄燒燬了整個的中國。

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上將常對我們這一批幕僚說：七七初時的軍事準備，並不够達到理想的充份。

第一：徵兵制度是始於民國二十三年，四億

以上人口的一個大國，想在兩三年內，完成和澈底實施征兵法令，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兵源，怎能對外作戰？

第二：是交通通信。大陸的交通建設，由於面太廣濶，一向就不夠健全，即使有一點初具規模，也只限於沿海和人口密集的地區。當時預想抗日作戰是逐漸西移內陸，那末被敵人所暫時佔領的地區，都有交通設備，而我們所保有的地區，反而是交通不便，那末在兵力運用上，戰爭的機動上，都失去了靈活。在七七前後，浙贛路才剛剛完成，湘桂路還沒有暢通，其他如西南各公路，更是完全沒有完備。

第三：是武器。七五山炮以上的火器都得仰之於國外，我們真正能自行製造者，僅不過是機關槍與輕武器的彈藥，海空軍的整備，則更不必談。

各位都知道，戰後大西洋公約國家，爲了統一步槍機槍輕武器的口徑，就費了三數年的時間。在七七當年，我國可說是工業落後的國家。雖然在形式上是業已政令統一，而實際上還是在割據之下，希圖武器的統一和補給，是談何容易？

第四：是訓練：中央軍校創校才不過十多年，海空軍學校，不過是初具雛型。農村的老百姓——兵源——連螺絲解維都認不得是什麼東西，怎樣還知道什麼是來福線。

兵源交通裝備訓練既是如此，要一位執政的領袖，非被迫應戰不可，你想這是一場多麼艱鉅的工作！

二、八一三才是抗戰的真面目

七七不過僅是抗戰的序曲，可是仗已經打開了，能半途而廢麼？以當時群家的心理，可能導致離心離德，使軍閥政客，尤其是中共，來造成很混亂的局勢，陷國家民族於滅亡。

七七事變是始於北平的蘆溝橋，假設又以一次地方事件來結束，當然不會希望這一股戰火延蔓到華南來。可是在當時的形勢，敵我雙方都在構想使這個戰爭擴大，以求達成各自所預期的目的。

在日軍方面來說吧！九一八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冀東，鯨吞而兼帶蠶食，其略地不爲不廣，打擊我們不爲不大。可是無論敵方是如何的凶神惡煞，却並沒有使我們的中央政府有所搖動。相反的，抗日觀念幾乎成了每一個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意識，雖然還有以抗日爲幌子，而別俱用心的人，到底還是少數。其中除共匪外，舊軍閥也好，舊官僚也好，新失意政客也好，總算還有一點良心，都一致擁護中央，以對付日本，這當然都是領袖的德威所感召而來的。在民家方面，更不用說，其憤怒的情緒，爲有史所罕見。所以日軍在東北與在華北的侵略，在國家的利害上，在民族的尊嚴上，雖然是受了莫大的打擊，但是這僅是打擊所受到的外傷，而不是細菌。像人體一樣，儘管斷一隻手，切一隻腳，而全身的細胞組織，反而會堅強起來，以維護心臟。日軍爲了想打擊我們的心臟，當然要捕捉我軍的主力，我的主力既在南方，那末戰火感染到南方來，乃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在我方呢！戰場若能控制在距離心臟較遠的地區間，那末既易於調整戰線，又可加大縱深，

當然是有它的優點；可惜當時在北方的部隊，並不能真正的派上用場。這並不是說北方的部隊不願抗日，而是他們傳統的訓練，尙不够近代化，連同武器裝備，均不足以抵擋日軍的鋒銳。舉一個例子來說：現代化的會戰往往是用優勢的火刀，來鎮壓或席捲着戰場。北方部隊中的大刀隊，還使得出勁兒來麼？在開戰的初期，假設在士氣方面，我軍先受到嚴重的打擊，那末可能掀不起來團結一致的精神。

在抗戰開始的初期，日軍閥一再狂妄的宣稱：說三個月就可以解決中國；這種危言聳聽，當年曾經迷惑於國際之間，我們在初期若不能打出一場爭氣的戰爭來，不僅不能獲得國際上的聲援，可能連一些同情心都不會付與。戰爭既然開端了，而又非打不可，那末我們必須求謀一個機會，先給日軍的銳鋒來一次迎頭挫折，然後這一仗才能真正的打下去。

爲了捕捉這一場會戰的時間空間於有利，我們也選擇了淞滬地區；這便是八一三的開始。

三、淞滬會戰在戰略上的價值

以純戰術的眼光來看，淞滬會戰，我軍是相當的吃虧。敵軍的海空軍都可以支援陸戰，所謂：「擊滅於水際」的戰法，在裝備劣勢的我軍來說，根本不容易行通。僅以敵軍艦砲來計算吧，便超過了七百門以上。但是我們運籌帷幄，計算比較得失，仍然覺得在戰略上的所得，將遠超過戰術上的所失，因此我們才將國軍的精銳，孤注一擲的投在這個戰場上。

我們爲抗日，早已日積月累的那理準備着；所以在京（南京）滬（上海）地區間，已作了兩道陣地，第一道是在蘇（州）嘉（興）線上，名之爲興登堡陣地，第二道是在南京湯山的外廓，名之爲東南陣地。因之有些軍事評論家說：若早將戰場移到這兩條陣地上，也許可以減少較多的損傷，或更可以延長我軍抵抗的時間。這種「事後有先見之明」的判斷方法，固未可厚非，可是兩條線的縱深，總不如三條線來得深大，逐次抵抗，節節打擊，也是當年厘訂作戰方案之一，可是敵軍登陸了金山衛，超了我們的後路，致令興登堡陣地和東南陣地，都沒有得到它預期的效果，這當然是令人慚愧而惋惜的事情。但，淞滬會戰所獲致的前因後果，確實奠定了八年勝利之基。從廣義的戰略價值上來看，八一三是成功的。若是「見樹而不見林」，徒然拘泥於戰術上的得失，那末可能會犯更大的錯誤。

國際間的錯綜複雜關係，相互牽連，各不相讓，這種史例自古有之，但莫若近代之甚。「三國還遼」，這便是中日戰史上的一個證例。韓戰不能超過鴨綠江，越戰不能轟炸北越，以美軍力量之強，尚且不能隨心所欲而爲，其原因不外乎是一言以蔽之：內憂外患。中國在抗戰初期是弱國，焉能不顧及到國際上之關係與國內之民心輿論？這種想法，不僅是超越了戰術，也躍過了戰略，而進入到政略的境界。現代術語：「心理作戰」，還不過僅是其中的一部份。

上海是當年遠東國際商業中心，英美法以及各國在這地區所投下的資產，不下數十億美金，

要打得他們也「肉痛」，才發生痛癢相關的切膚利害，才會覺得這場戰爭就是他們自己的戰爭。我敢說：爾後歐洲戰爭，以及太平洋爭奪戰，都緣於中國抗戰的發軔，誰也無法置身度外，抱着坐在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心情。世界的社會秩序是連鎖性的，至少在那時的人類，誰也沒敢幻想到太空去。

在甲午（一八九五）中日之戰，北方打仗，而南方觀望；清廷固屬政治腐敗，但當年却無軍閥割據的形態，尚且舉國還不能一致禦侮。在七七和八一三的期間，後方的川滇，既沒有真正的統一；即使在中原，山東尚有韓復榘，隴海線上還有孫殿英，一向是素無紀律，又缺乏訓練的部隊。有這些雜牌，那裡還談得上戰術思想的統一？中央軍在淞滬打了第一陣，這不僅充份表示了廣義的身先士卒，而且也是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

從許多戰史來看，一個國家首都的失陷，大概都代表了戰爭的大勢已去。遠如庚子不談，以第二次大戰來看吧？巴黎失陷，法國即失去了抵抗德軍的力量。而我們呢！當首都南京淪陷時（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何嘗沒有幻想到「城下之盟」？！所以便大加屠殺，以表現其嚇阻性的狠勁兒；而且還不立即西上，似乎在等待我們來俯首稱臣。一直到了民國二十七年的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近衛文磨才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於是這一場戰爭，才真正進入了到舉國一致的長期抗戰。

這又是何以致其然的呢？可以說是起源於八

一三的效果。也可以說：淞滬會戰，縱然在戰術觀點處於不利，而在戰略的價值上，國際的觀瞻上，國民的向心力量上，是一石三鳥的成就。

四、抗戰期中國國際的形勢

在抗戰期間，我們有一句極爲重要的口號：「以空間換取時間」。這不是一句老僧常談，而是我們領袖最簡明的而堅決的作戰方針。記得抗戰是始於民國二十六年夏季——七七和八一三，歐戰是後此二年的一九三九，而太平洋戰爭則是更後四年的一九四一，先撇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談，即專以時間來談吧！這是多麼漫長的一段難以煎熬的時間？

中國抗日，本是哀兵赴戰，其獲致國際的同情是自不待言。可是同情固屬可貴，又何助於我們的實質呢？

說也奇怪，當時英美等民主國家僅給與我們道義上的支援，以外最起勁的反而是蘇俄。

歷經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蘇俄永遠是扮演着一個險惡的丑角。我們且舉幾個實例來看：

第一：日軍佔東北（九一八），這是繼日俄戰爭之後，日本與蘇俄間發生衝突的最高峯；可是蘇俄不僅沒有與日軍作正面的衝突，而且將中東鐵路以破銅爛鐵的折價，賣給了日本，以助長其侵略的錦上添花。

第二：可是一到我們對日真正發生抗戰，便和我們來訂了一個所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在交換物資的條件下，還給與我們一些微不足道的武器援助。在表面上這是迎合了我們共同抗日

的心理，實際上是惟恐我不打，更怕我們會半途而廢；一直到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之後，（一九三八年十月），確實認清了我們一定會抗戰到底，馬上就撤退了對我們的一切支援，而反轉來在暗中助長中共的坐大。

第三：所謂張古峯事件，是在我們抗日初期中所發生的，也是一次日蘇間的武力衝突。照理，既已發生了熱戰，又有中國戰場的牽制，這是給與蘇俄對日奪回北滿的絕好機會。可是蘇軍使用了數倍於日軍的兵力而加以鎮壓之後，便雷大雨小而告以終結。

第四：是在太平洋開戰的前夕一九四一年的四月，日使松岡洋佑在莫斯科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而松岡離俄時，史達林還在車站上和他擁抱別別。

第五：最顯著的是在日軍即將無條件投降之前，蘇俄才開始對日宣戰，以撿勝利的便宜。以上僅不過是在我抗日期間，蘇俄在國際間所要的毒惡末技，總想借刀殺人，而他自己却刀不刃血以坐收漁利。

其次，我們再看看民主國家吧！

歐洲在一九三九年發生戰爭後，因初期英法便一敗塗地。縱令對我們友好，僅不過是只賸了一點同情心而已；根本是自顧不暇。不僅乎此，連滇越，滇緬兩條通經國際的交通線，都在日本威脅之下，完全將其切斷。

至於說到美國，當然是一向與我國友好，可是美國與歐洲素有血緣上的關係，因之總帶有一點先歐後亞的基本觀念。歐洲的失陷，自然不肯

袖手旁觀，而預期的戰爭，更不希望有兩面作戰。所以儘管美日間的關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來栖三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倉促使美，在表面上所須談判的是「現買自運」（廢鐵與石油），在骨子裡却還來帶着迫使我們和日本構和的條件。

我在此並不想追溯以往而來埋怨我們當時的與國，我無寧是將心比心來相互的付與同情。我所要說明的是，當年國際間的情勢是如何的複雜！直令我們不得不孤軍奮戰。我們的抗日，是早於歐戰三年，早於太平洋戰爭五年，誰也沒有比我們吃過那樣多的苦，誰也沒有比我們打過那樣長的仗，所以我們只好大聲急呼的喊着：「以不變應萬變！」

五、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抗戰的

因果關係

一九三九年的歐洲戰爭，不僅對我們沒有絲毫的協助，而且還增長了敵人的威風。因為英軍在鄧克爾克的退却，法國的雌伏在維琪，使得德軍得以舍西擊東而長驅直入到史達林格拉。在演成了德軍席捲全歐的態勢之下，日蘇既有互不侵犯的協定，而日德義復有三國軸心的聯盟；日軍還有什麼後顧之憂？不僅可以將其本土的兵力來用到中國戰場，即使一向爲了應付蘇俄的關東軍，也可以抽調若干來投入中國。在爾後的二年半間，毫無忌憚來對我橫行。

太平洋戰爭發生於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這是在我們抗日整整四年半之後。在表面上雖

然中美英已是同盟來對日宣戰，惟在初期的時間，是否對我們有利，至今還很令我懷疑。

讀者諸公還記得當年珍珠港發生事件的情形麼？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在西方國家，可說是禮拜和休息的日子；日軍僅用了一百零五架空軍便偷襲擊毀了美軍在太平洋的艦艇八十四艘（共只有八十六艘），和整整齊齊排列在機場上四百架飛機。雖然日軍並無膽量或力量來連續攻擊美國本土，可是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實力，却損失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之間。

英法在歐洲失利，早已無力顧及遠東，所以滇緬，滇越兩條我們的國際動脈，久被切斷，已如前述。所以越南早已受到日軍的監視，當年駐河內的大使，便是爾後在臺灣駐中華民國的日使芳澤謙吉。當時的英國呢！爲了海軍還保留了一部的實力，想在遠東來發生一點阻嚇作用，曾派了兩艘巨艦——威爾斯親王號與却敵號來坐鎮新嘉坡；可是開戰不到一天，便爲日海軍航空隊六十架魚雷爆擊機所襲擊，連一砲（指的是主砲）也沒有發，終於葬身海底。

真正的盟軍，只有麥克阿瑟將軍一點陸軍部隊，在菲西的巴丹半島，作了一段特殊的殊死戰。

太平洋戰爭本質是海空軍性的，日本的海空軍既已席捲了大半個太平洋；在某一段時間，其所使用的陸軍，僅不過是爲了佔領土地，以接收海空軍的戰果而已。其所抽調的兵力，大部份是來自其本土與我國東北——關東軍。在一九四二年之間，不僅沒有減少對我軍作戰的部隊，而且還更增加壓力，以期望先行結束對中國的戰爭。

其間所謂浙贛路之役，四次的湘北會戰，以及湘桂獨山之役，還有滇緬，滇越沿線之戰，在在都是抗戰中的幾場硬戰，也是我軍最苦悶的一段時期。

不是我們自誇的話：

「在太平洋開戰的初期，是我軍幫助了太平洋戰區，而不是太平洋戰區幫助了中國戰場。」

這話怎講呢？日本是一個島國，本應是和英國一樣，重海輕陸。但是因為日本陸軍一向是主張北進，所以還是以陸軍為主體。當時的執政者是東條英機，既出身於陸軍，還是執迷不悟的相信陸軍是萬能。

舉一個小例來說吧！阿圖島之役，日本守軍僅僅只是陸軍一團的兵力；而美軍却集結了大量海空軍的威力去加以攻擊，當然阿圖島終於是被攻下來了，可是美軍真正登陸的正確時間，却是在日軍作了最後的抵抗而集體自殺之後的兩星期。兩星期之間，日軍已絲毫沒有還擊的跡像，美軍為什麼不即早登陸呢？這充份說明了在太平洋的戰爭中，美軍對於日本陸軍的重視，其謹慎的態度，是到了怎樣的程度？

在初期暫且不說，就以太平洋戰最末期來說吧！沖繩島的爭奪戰，美軍挾雷霆萬鈞的陸海空軍兵力，而死傷却數倍於日軍，以當時兩軍的兵力和軍種來比較，是一對三。至少日軍是絲毫沒有海空軍的力量存在，可是僅以陸軍，又乏補充與補給，却還能作困獸之鬥，這是說明了日本陸軍的堅韌性。

儘管太平洋是海空軍的性格，可是陸軍的價值與地位，在日軍的賭本之中，還是絕大的籌碼；假設日軍能掌握更多的這種籌碼，那末太平洋上的美軍，還有一陣子的苦頭可吃。真正能牽制著絕大多數的日本陸軍，當然要數到我們中國戰區。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當年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地區吧！日軍之進攻星馬泰緬，其最後的目的，是想進出印度，甚至有打通歐亞，作與德軍會師的幻想。可是由於我軍之遠征緬印，卒以打破了日本的迷夢。在緬西仁安洋之役，我軍充份掩護了英軍的安全撤退，這便是極好的證例。

記得在抗戰的初期，我們邀請各國駐華使節移駐後方；外交團會有遷居昆明之議，當時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為日軍決無進攻滇黔高原之可能。可是事隔數年，而日軍却達到我們的滇西，在中國內陸的日軍也會達到過湘黔的邊區。由於獨山與松山兩次會戰的勝利，不僅直接解除了日軍對我們大後方的威脅，而且間接還阻止了日軍在東南亞的進展。

日本軍閥的窮兵黷武，北進之聲是市囂塵上，其陸軍的「假想敵」一向是指向蘇俄；那裡會將當年四分五裂的中國放在眼裡？然而在最後的結果，日本陸軍的使用，却幾乎完全在中國。假設不是我們把他們拉鏟了達八年之久，我敢說所謂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戰史，是會怎樣的演變和寫法，真不敢妄加推測！

所以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縮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因子。

當然太平洋上的盟軍，也是各自盡了極大的職守，其細節自有待於史學家來評定。而八年抗戰，讓日軍的泥足愈陷愈深，消耗其絕大的國力，才使太平洋戰爭，如此順利的戰勝，這是鐵定的事實。

一定有人會問：中國戰區雖然牽制了日本大部份的陸軍；而海空軍呢？我不否定盟軍美國在太平洋上所付出了的極高的代價。可是誰都知道！戰爭第一是要錢。第二也是要錢，第三還是要錢。錢？錢！錢！錢是戰爭上最大的資本。換言之全面戰爭，經濟乃是重要的一環。

日本在對華的戰爭中，早已打得來民窮財盡，到了發動太平洋戰爭，已是外強中乾，變成了強弩之末。日本之所以在對華作戰五年之後，還要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原故，無非是為了奪取南洋的資源；煤、鐵、石油與橡膠。這些資源，既然無錢去買，或者是有錢也買不到，那末只好用武力去奪取了。

美日開戰的前夕，萊栖三郎使美所爭執的問題，不是：「現貨自運」麼？假設美國一向肯答應日本「記賬代運」的話，或許太平洋戰爭不會那樣快的打起來！這種假設，當然是一句玩話，事實上或許不會那樣的簡單；可是日軍發生戰爭，而且侵略戰爭的本質，乃是為了奪取資源，這就是戰爭的定義。

日本可惜是夕陽無限，已近黃昏，在奪取資源之後，還沒有來得及享用，便吃了敗陣。

為什麼來不及消化呢？則由於對中國的拉鋸戰過久，而虧損太深。我們可以看見，日本在發

動了太平洋戰爭後的翌年一九四二年的九月，才成立軍需省（日文之「省」即是「部」），想將軍需工業一元化，而為時之太晚了。

六、原子彈真正結束了戰爭麼

原子彈的投擲也是在八月。（一九四五）。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摘錄引用向上將應欽在他的「廣島行」中一段，以來作一個答案。

抗戰本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爲，我們和美國都是被迫而戰。所以從開戰之初，便早已考慮到如何結束。當時在中國戰場已苦戰八年，而美軍在太平洋上也已歷戰三年之久；歐洲戰場既業經息鼓，軸心局勢，早已瓦解，假設東方戰場，若一再的拖延，畢竟是兩敗俱傷。所以中美盟軍，正集中力量，在海上正講求躍島前進；在陸上我軍正進駐柳州，計劃奪回兩廣，拘束着絕大多數的日本陸軍，使其不得轉用。

可是就這樣，能馬上結束戰爭嗎？正如上述，還是相當的難題。在這一方面，美軍比我們更急，因為在中國戰場，日軍既已成爲甕中之蠶，形勢馬上可能急轉直下。而美軍若再要攻擊日本本土，還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則尙難逆料！因之美軍一再想使用非常的手段，以達成結束戰爭的目的。

美軍對於新武器的發展，我事前雖有所警覺和了解，但對原子武器的製造，則並無所悉。這是美國國防上的高度機密，不僅是對同盟的我們，而更是他們自己在太平洋戰區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總部，也都一樣。麥帥回憶錄上一佔

領日本」那一章裡，他對原子彈投擲的一節中，就會有這樣的記載：

「這種核子武器的發展，在投擲廣島之前，我亦一無所聞」。

當波特拿准將（註：美軍駐昆明的參謀長，曾於原子彈投擲於廣島後的兩小時，奉美軍命通報當時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該員後來曾於韓戰中任管理俘虜營司令官）向我報告了原子彈投擲之後，爲了協調雙方作戰的戰術問題，我當然不免就要向他詳詢其投擲後的成果和實際狀況。可是波將軍並不會給我圓滿的答覆，僅僅說明了一些有關原子彈的威力！廣島全燬，在五年之內，不會生青草，而十年之內，也無法再住人。

這種神話性的描述，徒然增加我的迷惑。我當然也略略知道原子彈製造過程中在科學上複雜和困難，以及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龐大擔負；然而美國到底已製造完成了幾顆這樣的原子彈呢？以歐洲戰場爲例吧！德軍的 V₁、V₂，固然與五年不生青草，十年不能住人的威力，還絕對的懸殊，可是 V₁、V₂ 也是出類拔萃的新武器，但却未能制伏英國……

這並不是說我當時對於原子彈的不信任或忽視；而是說單憑一種新武器，就來總括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戰爭，未免太像是封神榜上的神話；應非我輩職業軍人該有的信念。

俗話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是指三國演義上諸葛孔明借東風的故事，當然不應作爲戰史的例證。然而廣島的原子彈，却真是這一場戰

爭結束因素中的東風，因之而縮短了一場戰爭的時日。

日本軍閥的主戰派最歡喜濫用中國的成語；而曲解所謂：寧爲玉碎，無爲瓦全的說法。眞要是本土作戰的話，又豈足以挽狂瀾於既倒？而損傷與被害，決非廣島千百倍所能比計。無可諱言的，原子彈可能是救助了日本，而不是傷害了日本；所可憐的是！廣島近三十萬的人民，却無辜的背上最後的十字架。

七、以德報怨

蔣公總統對處理戰後日本問題的最高原則是以德報怨，論者有覺得太優渥了；其實這並不是光對日本，而是對全人類的。換言之這也是中華文化處世的哲學，中華文化的基本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八個字，很多人都將它讀成四段，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却有另外一種讀法和解釋，那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解釋也是一貫的，即忠孝仁出於愛，信義和出於平。前者是絕對的，是感情的；後者是相對的，是理智的。可是理智必先發自於感情，所以「愛」是人類相處的最上信念。

聖經上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上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利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愛是永不止息。」不計算人的惡，……便是以德報怨。

孔子的禮運大同篇，聖經的哥林多前書，國父的三民主義，才是消弭戰爭的眞諦。